

康有为思想研究

钟贤培

主编



松栢樓園
啼花放
山池悅
草堂
安眠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康有为思想研究

钟贤培 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开本 11.3125印张 1插页269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61—0143—0/B·7

定价：4.15元



康有为像

南海县康有为博物馆供稿

前 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与洪秀全、严复、孙中山等一样，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他是中国资产阶级诞生以后最早出现的杰出的政治代表。他一生满怀爱国激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他大声疾呼变法，呼吁社会改革，谋求救亡图强的治国之道，艰难跋涉在“山河已割国圯攘”的历史途程之中。虽然，他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仅仅是昙花一现，失败了；他上下求索，竭思殚虑，构想一个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蓝图，由于不符合历史潮流，也被历史的浪涛所淘汰，并终于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悲剧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但是康有为的历史功绩，并不在于变法本身的成败得失，而在于他以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的历史眼光和过人的胆识，透过历史的重重苦雾，看到了延续几千年的，被封建统治者神化了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的历史必然，勇敢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石破天惊地提出了用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代替封建政制的救国主张。这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它像春雷的巨响，震撼着“万马齐喑”的封建古国，也使“山河尺寸堪伤痛”，“贾生痛哭欲如何”的爱国志士，看到了救国的曙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康有为不仅是一位政治维新的领袖，而且是一位学贯中西，杂糅经史，勇敢地向封建传统思想、传统观念、传统文化猛烈开火

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启蒙了一个时代人们积淀的封建思想和意识观念，开拓了一个时代新的思想风尚。同时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思想上沉重的传统的封建文化的积淀，也不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近代这个民族灾难的时代的产物。从康有为一生的思想、文化素养和生活情趣，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爱国者的救国热忱，不甘屈辱的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也体现了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开始觉醒，上下求索而又不能真正掌握历史的巨轮，找到能医治沉疴的“神方大药”的爱国者的徘徊、困惑和固执，甚至不谙世情的迂腐。康有为也正是以他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启迪着后来的革命者，起到一个资产阶级改革的先驱者的积极的启迪作用。

康有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他的思想带有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特点、素质，影响波及东南亚一带。十多年的海外流亡，游历了三十二个国家的经历，使他有机会与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和人民群众广交朋友，切磋学问，成为一个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而国外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考察各国的政制风情，接受西方最新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科技思想等等的熏陶，触发了他思想上的变化，康有为后期经济思想、科技思想、美学思想和人才思想的发展，就表现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上的飞跃，带有鲜明的属于世界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时代色彩。

广东是康有为的故乡，广东人民为本省出了康有为这位世界历史名人而感到自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对康有为广东也像全国一样，未能给予他实事求是的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研究终于随着政治上的变化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论著相继发表，一个重新评价康有为的热潮，在广东，也在全国正方兴未艾。今年，是康有为诞生 130 周

年，也是维新变法9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曾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民主和富强作出贡献的人物，华南师范大学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将康有为研究列为重点科研课题，并在南海县的支持下，成立了康有为论著和研究丛书编委会，负责编撰康有为论著与研究丛书，计划在近几年内陆续出版如下著作：《康有为思想研究》、《康有为哲学思想研究》、《康南海教育文选》、《康南海诗文选》、《康南海政史文选》、《康南海哲学文选》、《康南海经济、科技文选》和《康有为著作与研究资料索引》。参加这套丛书编著的包括历史、哲学、教育、文学、经济等学科的同志，我们试图通过学科的横向交叉研究和合作，吸取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康有为的最新成果和新发现的史料，深化对康有为思想的认识，展拓多层次的思想研究，给予康有为一个历史的公允的评价，也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

当康有为论著和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之际，恳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

曾近义

钟贤培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前言.....	(1)
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先驱者的一生.....	(1)
(一)家世及青少年时代	
(一)教学与著述	
(三)领导维新运动	
(四)出亡十六年	
(五)最后的岁月	
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	(36)
(一)向往资产阶级政制的变法思想	
(二)建立人类未来大同理想社会的大同思想	
(三)保皇立宪思想论析	
三、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20)
(一)宇宙发展论	
(二)社会发展论	
(三)社会变革论	
四、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157)
(一)“以商立国”，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	
(二)“物质救国”，走工业化道路	
(三)理财为立国之本	
五、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179)
(一)将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上	

(二) 主张变科举、兴学校、建立资本主义教育体制	
(三) 宣传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四) 康有为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六、康有为的人才思想	(216)
(一) 人才思想产生的时代契机	
(二) 丰富新颖的内容	
(三) 康有为人才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七、康有为的文艺思想	(232)
(一) 文学思想的时代品格	
(二) 近代美学的先导	
(三) 诗歌的审美特征	
(四) 近代“新文体”的滥觞	
八、康有为的科技思想	(275)
(一) 近代科学技术成就对康有为的影响	
(二) 对比中西, 探讨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三) 发展科技的策略思想和实践活动	
附 康有为年谱新编	(304)
后记	(353)

一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 先驱者的一生

康有为（1858年—1927年）生长于中国历史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艰难跋涉时期。他满怀爱国激情，以救亡图强为己任，努力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疾呼变法，倡导改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出了贡献。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在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不愧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先驱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最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他始终如一的爱国、改革的精神和业绩，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的敬仰和纪念。

（一）家世及青少年时代（1858年—1889年）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以后，因脱险不死，改号更生，1917年参与溥仪复辟失败后，再度脱险，又改号更甦。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人。

他的家是粤中名族，世以理学传家，十三世为士人。高祖康辉，官至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健昌，官至福建按察使；祖父康赞修，为连州训导；父亲康达初，曾任江西候补知县；叔祖康国器，咸同年间，跟随左宗棠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功擢广西巡抚；另一叔祖康懿修，则以布衣办七县团练，维持地方上的封

建秩序，成为当地的豪强。康有为家族世代为官，在当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经济生活，而且，在他小时候，家族中人多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这给康有为以深刻的影响。

康有为是康家长孙，他的降生，给家庭带来了欢乐和希望。祖父远在连州任上当即写诗志贺，诗中有“书香再世汝应延”之句。康有为从小聪敏，四五岁即能背诵唐诗数百首，七岁能写文章，家中对他及时施以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以期将来能成大器。康有为十岁丧父，家道稍落，跟随祖父到连州读了三年书，深受圣贤之学，先正之风的熏陶。他读了《明史》、《三国志》、《大清会典》、《东华录》等书，又频阅邸报，览知朝事，十一岁即仰慕曾国藩、左宗棠之功业，并产生了朦胧的建功立业的抱负。

十四岁时，他回到家乡，与昆弟聚学于叔父新建的澹如楼及二万卷书楼中，有诗酒之欢。在祖父与家人的督责下，当年开始参加童子试。其实他对写八股文并不感兴趣。因家中小有藏书，他又好涉猎，所以杂书也读了不少。除史学、说部、集部、经说等等之外，还翻阅过《瀛环志略》、《地球图》等书，知道了一些国际政治和世界地理方面的知识。

1876年，康有为十八岁。这年应考乡试失败，转到广东名儒朱次琦那里读书。朱次琦也是南海人，与康有为的祖父是好朋友。他弃官从教，讲学于礼山草堂，其品学造诣，与明末清初顾亭林、王船山有相近之处。他的学问根柢是宋明理学，但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颇有心得，著书甚富。他讲学能扫去汉宋门户之见，贯串今古，而归宗于孔子。他以“四行五学”教导学生。所谓“四行”，就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所谓“五学”，就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要求学生具

有那个时代最高标准的道德学问。康有为十分庆幸自己得遇名师，发愤攻读，跟随朱次琦三年，打下了理学、政学的基础。康有为对朱次琦讲的陆王心学，特别感兴趣，认为它“直捷明诚，活泼有用。”^①康有为曾充满感激之情地回忆他遇到朱次琦以后的变化：“于时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从此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信乎大贤之能起人也，藉非生近其时，居近其地，乌能早亲炙之哉？”^②

康有为少年老成，圣贤之书、义理之学深种于他的脑海中，开口闭口辄曰圣人，被人送了一个雅号“圣人为”。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才十岁，但“执丧如成人，里党颇异之”；十八岁娶妻时，按俗例庆贺的人可入室戏新妇，但他“守礼拒之，颇失诸亲友欢”；十九岁祖父去世，他考究了三礼之学，“与诸父结苫庐棺前，缙经白衣不去身，不肉食，终是岁”。由于他守礼法古，一步不逾，家族乡里莫不敬畏。可见，他从小对于传统礼法，孔孟之道，是怀着一种庄严神圣而诚挚的感情的。

二十来岁，正是充满了活力和幻想的年纪。康有为读书有得，日有新思，开始偏离老师的轨道。例如，朱次琦最推重韩愈，他却不以为然，还在老师面前说：“昌黎道术浅薄，……《原道》一文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朱次琦厌恶禅学，他却忽然“绝学捐书，静坐养心”，对佛学产生了兴趣。他觉得传统的学术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合拍，常常思考怎样才能找个安身立命之所，不要虚度了此生。康有为降生在封建末世混乱黑暗的

①梁启超：《康有为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以下简称《戊戌变法》）。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

年代里，清朝统治腐败，国家积弱不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步步进逼，内忧外患接踵而来。1858年他出生时，太平天国反清起义的号角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天动地，1878年他二十岁时，边疆不靖，烽烟频举，祖国处于列强环伺之中，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地。康有为从小同情人民疾苦，“童龀时，见族戚邻人贫病者，惻惻悯之，辄密取先母劳太夫人钱，或擅取米施之。”^①他早年写的文章《不忍篇》中也表露了“哀民生之多艰”的心情：“予非不乐生也，予出而偶有见焉，父子而不相养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穷民终岁勤动而无以为衣食也。僻乡之中，老翁无衣，孺子无裳，牛宫马厩，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饱糠核也，彼岂非与我为天生之人哉，而观其生平，曾牛马之不若。”^②

他一时想想民族的命运，一时又想想个人的前途，感到十分苦闷徬徨，以至心潮起伏，歌哭无常，同学们都以为他得了什么精神病。1878年冬天，他决意从佛学中寻找出路，就辞别了朱次琦，回家去了。

南海县的西樵山，水秀山清，环境幽美。康有为在这里潜心学习佛、道之书。他住进了山上的白云洞，枕石卧草，披发行吟，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恣意游思于万物之上。一方面他想借此排除内心的苦闷，寻求思想的解脱，另一方面他仍在苦苦思索宇宙本原、社会哲理和人生意义这些重大问题。由于他有强烈的用世之心，静坐学佛的结果，没有使他超脱尘世，遁入空门，反而使他把佛教的侧隐与布施之心，转为救世之念。因此，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在西樵山读书时，康有为结识了前来旅游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两人成为好朋友。张鼎华在京师当官，对国势和时局自然

①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康论》）第1053页。

②《康论》第15页。

知道很多。当时，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所谓中兴名臣在鼓吹洋务新政，自强求富，搬进些许西方军事、科技知识，办起了一批新式企业，企图以此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一群感觉敏锐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管理权、保护民族工商业、商战固本等改革呼声。康有为从张鼎华那里，知道了不少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各种新书以及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掌故，更增加了他对时局的关心和对朝政的注意。

朱次琦与张鼎华，是康有为青年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师友。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①康有为以经营天下为志，专意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实学，时时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经世文编》、《文献通考》、《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輿纪要》等书研究，写下了大量有关治国理民的心得笔记。但是，不管是汉学、宋学、还是佛学，都没有使他找到出路，所以他在1884年写诗时说：“别有遁逃聊学佛”，“忧患百经未闻道”^②。

近代以来，广东最早遭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也最早感受到西方文明的气息。康有为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介绍西方的书籍，他少年时就读过《瀛环志略》和《地球图》，青年时又读到《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及一些译本西书。1879年，他到香港去游览了一次，对西方文化开始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他看到英国人把香港治理得井井有条，楼房宏伟，道路整洁，治安严密，与内地大不相同，十分惊讶。感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能把他们与夷狄同等看待。以后，他留心收集有关西方的书籍，扩大见闻。1882年夏天，他到北京应顺天乡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

②《三年》，见《康论》。

试，没有中式，南归的时候，路经上海。看到租界里的繁盛，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加赞叹了，心想，西人治属地尚且如此，本国的政治肯定更加进步，其所以能这样，一定有优越的道德学问为根本，我非要探究一下不可。他就把江南制造局和外国教会里所译的西方书籍都买了来，用箱子装运回家。据记载，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印的西学新书，三十年间售出不过一万二千册，而康有为前后购以赠友及自读者，达三千余册，为该局售书总数四分之一强^①。当时译出的书，大都是关于工艺制造、兵法、医学及耶稣教的经典，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书几乎没有。康有为求知若渴，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游记都广泛阅读，这样，他对西方的看法与传统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已全然不同了。1886年，他曾通过张鼎华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②这说明他接触西学以后，新的知识大大启发了他的思维，使他的学力“别开一境界”^③。

1883年，他在家乡首先破除旧俗，坚决不为长女同薇裹足，并与邻乡的美洲归侨区潯良首创中国第一个“不裹足会”，写了会例及序文。他得到一部显微镜，就兴致勃勃地捉来一些小生物，放在镜下仔细观察，“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1887年，他从事算学，于是依几何公理写作《人类公理》、《实理公法全书》，运用他所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形式逻辑思维方法，批判中国传统纲常名教大背公理，无益人道，论证人权、民主、平等的合理性，书中明显地渗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

①张伯桢：《万木草堂始末记》。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

③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

学说，可以看到康有为观念的更新与思维方式的变化，一种新的理想追求开始萌发了。经过几年的苦学深思，他把中西方知识学问糅合起来，开始摸索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救国之路。

1888年夏天，他又到北京应试。那时正是日本占琉球、法国吞安南、英国取缅甸，中国边疆危机四起，南方藩属相继丧失之后。康有为游长城、攀西山，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他想：“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①变法的紧迫感促使他提笔给当时颇有名气而又为光绪皇帝所信任的大官僚翁同和、潘祖荫、徐桐分别写了信，信中大谈变法维新已不能再缓，还责备他们未能尽职尽责。徐桐思想守旧，见信大怒，斥为“狂生”。康有为此举颇为引人注目，京城里议论纷纷。正好碰上祖陵山崩千余丈，一种天人感应、灾异警世的沉重感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康有为抓住时机进一步发表他的变法思想，并大着胆子给皇帝写了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向皇帝上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本是极为可贵的精神，但清朝政治黑暗，布衣上书为当时政策所不允许。康有为居然敢于违反成例，惹得一些顽固派大臣对他大肆攻击，并对他的上书予以扣压。但也有一些开明的官吏对他另眼相看，愿意跟他交往。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虽未上达，但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影响，他的名气渐渐大起来。他为了争取皇帝接受他的意见，多方奔走，结交权贵，并代他们草拟奏稿。一个忠心而刚直的侍御屠仁守请他代拟了几个奏章，专门针对最高层统治者提意见：一请停止修建颐和园，二请光绪的父亲醇亲王不要干预政事，三责宰相无状，请以灾异罢免，四请宦寺勿预政事。屠仁守因此获罪，革职永不叙用。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

康有为在京师呆久了，对朝局渐渐有所了解。他看到慈禧太后大兴土木，花天酒地；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宦官李莲英狼狈为奸，把持朝政；群僚趋炎附势，贿赂风行；士夫掩口，言路结舌。不要说变法改弊，即旧政风纪，亦难以维持。他非常失望，沉痛地说：“久旅京师，日熟朝局，知其待亡，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世间志意矣。”^①他的第一次努力遭到挫折，心情是十分矛盾的，眼看着中国将亡，救之不得，坐视又不忍，只好南归，再待时机。1889年9月，他离开了京师。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②

（二）教学与著述（1890年—1895年）

康有为在1889年冬回到广东，住在广州城的徽州会馆里。1890年春，他听说四川经学家廖平在恩科会试后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邀来到广州，住在广雅书院，就约了朋友黄季度一同前去拜会。廖平是一位今文经学家，在经学上颇有造诣，他写的《知圣篇》与《辟刘篇》，认为古文经典是西汉刘歆伪作，今文经典才是孔子真传，并说孔子是受命于天、有德无位的素王，他晚年改变早年之说是素王改制之举。这些新说引起了康有为的兴趣。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尊崇周公，从朱次琦学习时，攻读的主要就是《周礼》、《尔雅》、《说文》这些古文经典，后来又写了《何氏纠谬》、《教学通议》等书，都是尊从古文经学的立场的。他虽然也研究今文经典《春秋公羊》，但对今文经学并不太注重。开头，因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议论相竞，

①《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

②《南海先生诗集》（崔斯哲手写本）。以下引诗，如出自《南海先生诗集》只标诗题，不标出处。

但很快，康有为就接受了廖平的观点了。为什么呢？原来，他发现了可以利用这个学术问题为政治服务。

第一次上书不达的遭遇使康有为初步尝到了与守旧势力作战的艰苦。他在诗中写道：“虎豹豺狼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①为了打破守旧势力的堡垒，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康有为需要更有力的理论武器。现在，廖平这两篇著作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如果发挥《知圣篇》的观点，神化孔子，树立一个改革的祖师爷，变法不是就有了历史的依据和权威的榜样了么？如果发挥《辟刘篇》的观点，否定刘歆，进而否定传统封建文化经典，对进攻顽固派坚守的阵地，也未尝不是一个突破口呀！会晤廖平以后，康有为以一个政治改革家特有的敏锐与灵活，领悟到今文经学可以作为他战斗的武器，就迅速改变了自己尊信古文经学的立场，转而大讲今文经学，并利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进行议政。

康有为回广东就是打算致力于教学和著述的，他干脆把家从南海县搬到了广州城的云衢书屋。这年夏天，收了陈千秋、梁启超两位弟子，翌年，在长兴里正式开堂讲学。他以“勉强为学，逆乎常纬”作为治学的宗旨，把他鲜明的政治学术主张贯彻到教学中去。他教给学生的除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一门。“经世之学”的内容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他对当时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和宋学进行抨击，向学生灌输冲破传统、改革救国及变易进化等观点。据他的学生梁启超回忆，“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讲求智慧”。“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

^①《已丑上书不达出都》。